

亚洲需要进一步普及金融服务来促进增长

作者：[Sarwat Jahan](#)、[Elena Loukoianova](#)、[Cormac Sullivan](#)和 [Yongzheng Yang](#)

2018年9月18日



泰国曼谷，一位超市顾客正使用智能手机支付。在该国的城乡地区，人们广泛使用手机支付来获得金融服务（图片：Li Mangmang Xinhua News Agency/Newscom）

在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亚洲地区，进一步普及金融服务将使经济更快增长，同时降低贫困与不平等。

为什么会这样？当人们能够开立账户和建立信用额度时，他们的借款能力将会提升，也将能更好管理他们的储蓄和支出。这些都能让经济运行更加顺畅。

[我们的最新研究](#)[\[文件链接\]](#)显示了亚洲如何能从进一步普及金融服务中受益。

意识到差距

好消息是，通过普及自动提款机和广泛使用手机银行，亚洲使用金融服务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不过，虽然取得了这些进展，亚洲各国在普及、使用金融服务（即“普惠金融”）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例如，亚洲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男女差距在全世界均处于较高水平。在印度，最低收入群体中的成年男性仅有约 52% 拥有银行账户，而最高收入群体中的这一比例为 80%。

对于那些所谓的“获得银行服务”和“未获得银行服务”的群体而言，收入并不是造成二者差距的唯一原因。亚洲地区极具多样性，这意味着地理、金融部门结构以及政策等因素也很重要。

实施那些能广泛普及金融服务的政策，包括使用金融科技来更加广泛、有效地分配利益，可以帮助亚洲弥补上述差距。

广泛普及金融服务的好处

我们的研究发现，普及金融服务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普及金融服务可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他们可以获得贷款和保险来经营企业、开展教育健康投资、管理风险、抵御金融冲击——所有这些都带来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一点对缅甸、尼泊尔等低收入国家至关重要，这些国家只有不到 40% 的家庭拥有银行账户。

我们还发现，如果所有金融产品与服务普及率较低的亚洲国家能够提升至泰国的水平（泰国是处于普惠金融前沿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则本地区的贫困人口将下降 4% 左右，也即约 2000 万人。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程度（特别是向贫困家庭提供金融服务）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经济机遇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从而降低一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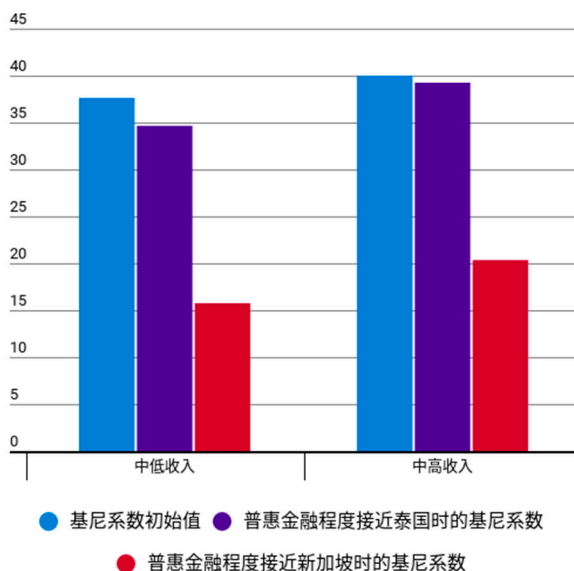
我们使用了一个衡量收入分配的统计指标，发现当各国若将其金融服务普及程度提升至新加坡的水平时（在新加坡，必要且廉价的金融服务十分普及），不平等程度会从目前的 30%-43% 下降多达 10 到 20 个百分点。

此外，如果老挝能达到泰国的普惠金融水平，则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将下降 5 个百分点，达到 2002 年以来所未见的水平。

降低不平等

进一步普及金融服务能够降低亚洲的收入不平等。

(当一国的普惠金融程度上升至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水平时，该国基尼系数的下降幅度；以百分数计)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计。

注释：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对收入进行分类。



另外，普惠金融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能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例如，我们发现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当更多家庭、企业能获得金融服务时，政府便可直接向个人和企业账户进行转移和支付。这将有助于减少政府的支出浪费，并且可能释放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使广大民众受益，如开展社会性支出。

正在崛起的金融科技

鉴于普及金融服务对经济增长和降低收入不平等至关重要，金融服务领域的技术创新（也即通常所说“金融科技”）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能将金融服务扩展到一些先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而这要归功于其低成本和易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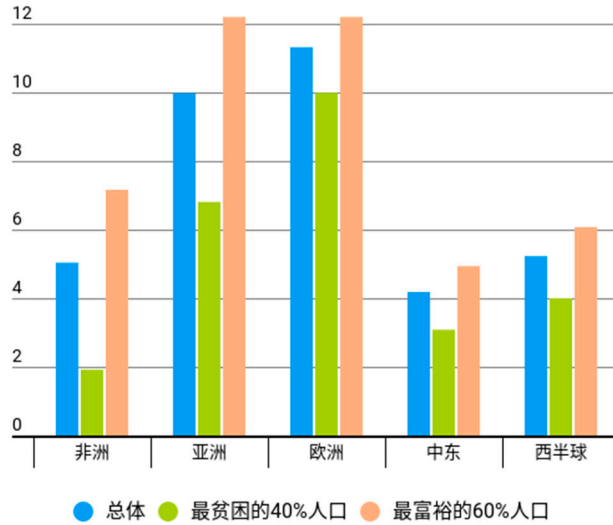
例如，中国是移动支付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7年，中国有61%的人口使用了数字支付，占该地区移动支付总数的55%，这一水平超过了部分高收入国家。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部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利用金融科技，如孟加拉、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亚洲地区也已经成为了移动钱包服务提供商和用户的一个主要中心，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移动钱包

在亚洲，穷人和富人在使用手机开展金融交易上的差距，仍然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百分数)



来源：Global Findex。



在诸如斐济、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汤加等太平洋岛国，人们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技术来获取基本的金融服务。手机银行帮助人们克服了基础设施上的缺陷，也超越了地理上的局限（而若要办理传统银行业务，如访问实体银行，则是相当困难的）。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但人们并没有平等地享受到亚洲地区金融科技带来的好处，这是因为亚洲城乡地区在使用金融科技上的差距仍处于全世界较高水平。

需要进一步普及金融服务

没有那种政策能够同时适用于所有国家。在实施广泛的政策组合中，亚洲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促进创新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例如，孟加拉小微贷款的兴起以及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移动支付的增加都突出表明：通过社会实验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深化并扩大金融服务，可以帮助更多人分享其带来的好处。

同时，继续实施改革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鼓励未获得银行服务的人们融入金融部门，也将有所帮助。

例如，萨摩亚的政策制定者在其“国家普惠金融战略”中列出的优先事项之一，便是对金融服务产品进行妥善设计和合理定价，以便人们（尤其是低收入人群）能广泛使用。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那些最大和最小型的国家都为如何推动亚洲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其关键在于，每个国家都应实施一套正确的政策。



Sarwat Jahan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的高级经济学家。自进入基金组织工作以来，她一直对拥有基金组织所支持规划的一系列国家开展工作，包括斯里兰卡、缅甸和圣基茨和尼维斯。她还曾在基金组织的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工作，负责撰写政策文件和指导说明，并针对前沿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小型国家开发工具箱。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若干跨国问题上，包括货币政策、增长战略、债务重组、资本账户开放、普惠金融与金融发展、小型国家面临的挑战等。她近期的分析工作主要关注了数字化的经济影响。在加入基金组织前，她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负责评估巴西、格鲁吉亚、印度和秘鲁的国家战略。她还曾于塔夫茨大学任教。她拥有达卡大学经济学本科学位和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Cormac Sullivan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的研究助理，负责孟加拉、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的相关工作，近期所负责的国家是帕劳。此前，他曾在基金组织统计部工作，曾广泛开展货币联盟（特别是东非共同体和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内货币和金融统计数据调整工作。在加入基金组织前，他曾就职于世界银行，负责评估西非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框架。他还曾在布基纳法索政府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工作。他在基金组织的工作重点是进行预测、经济研究和政策分析。他近期的研究涉及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信贷繁荣、旅游业和机器学习应用等。

他是英国人，拥有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学士）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硕士）经济学学位。



Elena Loukoianova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的副处长。在基金组织，她一直致力于国别工作以及金融监管、普惠金融、金融技术应用（金融科技）、金融稳定、资产负债表分析的方法和宏观审慎政策、评估与监测系统性风险的分析工具、基金组织规划等问题。她目前负责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并担任赴汤加代表团的负责人。2008年至2010年，她曾在巴克莱资本的新兴市场研究部任主任和高级经济学家（负责俄罗斯和独联体事务），并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任高级经济学家。她目前的研究重点包括政治风险、家庭债务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区块链的经济应用、系统性风险等。她拥有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和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立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



Yongzheng Yang 先生目前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驻菲律宾代表。之前近期，他还曾担任基金组织亚太部副处长和基金组织赴缅甸代表团团长。此前，他曾于 2010 年至 2014 年担任基金组织常驻太平洋岛国代表，并担任基金组织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萨摩亚代表团团长。

Yang 先生还曾就非洲和中亚国家开展工作。在 2001 年加入基金组织之前，他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麦考瑞大学任教 10 年。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普惠金融、国际贸易、一般均衡建模和发展问题。